

麦凯恩与美国难以治愈的越战创伤

汪舒明

麦凯恩生前长期致力于修复美国因越南战争而导致的创伤。但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,社会政治分裂、极化、对抗等越南战争时期就曾出现的病症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。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关于越战的选择性记忆,既难以让熟知美军在越南战场暴行的美国社会所接受,更难以让遭受深重灾难的越南人民信服。抚平“伤口”,内外实现真正的“历史和解”,仍将遥遥无期。

2018 年 8 月 25 日,麦凯恩病逝。麦凯恩出生名门,父、祖两代皆为美国海军上将。年轻时,他曾参加越战,成为越南战俘并被关押五年半。越战结束后步入美国政坛,他四次成功连任共和党籍参议员,还曾两次参加美国总统大选。死后,他备受哀荣。美国政府为他举行最高规格的国葬。为与这位传奇越战英雄道别,数千人在华盛顿顶着烈日和阵雨排队数小时。两位前总统、麦凯恩曾经的政坛对手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参加了葬礼;参、众两院的绝大多数议员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参加。美国舆论广泛对他致

以敬意,将他尊崇为体现美国爱国主义的“英雄”、坚持美国伟大原则的“独行侠”、共和党人的标杆。

作为一名越战老兵,麦凯恩是美国越战悲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。这场给美国带来深刻创伤、给越南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,给许多像麦凯恩那样的美国越战老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,为他们提供关于自身身份、立场的坐标。虽然,麦凯恩生前长期致力于修复美国因越南战争而导致的创伤。但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,社会政治分裂、极化、对抗等越南战争时期就曾出现的病症反而呈愈演愈

烈之势。

关于战争的“战争”:未曾治愈的越战创伤

出于根深蒂固的“美国例外论”,美国将历次对外武装冲突描述为“自由”抵抗“专制”、“正义”抗击“邪恶”、“光明”战胜“黑暗”的斗争。美国总是自视为光明、正义和必胜的一方。美国军人在大众支持下,心怀爱国热诚和勇气奔赴前线,最终往往能作为战争英雄

载誉归来。

但越南战争导致了此种“美国例外论”的幻灭,并由此导致了久久难以治愈的“越南综合征”。在越南战争期间,先后大约有 75 万美国军人参加了战斗,32.1 万受伤,5.8 万阵亡,还有 25 万患上了“创伤后遗症”,但战争仍以美国失败而告终。而且,美军在越南战场滥杀无辜的暴行,以及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,就连美国人也不再相信美国是“正义”、“光明”的一方,公众广泛质疑政府将年轻人送上战场的意义何在。美国社会政治也因越战陷入深刻的分裂

和极化之中,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怨愤、对立,难以在何为爱国、美国的使命和目标何在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,也不再能信任政府和领导人。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丧失了自豪感和目标感,其对外武装干预方面也往往举棋不定。

越战退伍老兵尤其置身于美国社会极化、分裂的前沿。一方面,他们成为这场不义而且失败战争的“替罪羊”。这些军人带着“捍卫自由”的信念和使命出发,在东南亚丛林经历长期苦战,不

(下转 15 版) ➡

➡ (上接 13 版)

我归纳了一下,商务印书馆英文读本的编纂,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:

一、不拘一格选英语人才。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夏瑞芳、张元济等,都是极为注意网罗英语人才的帅才,相当重视人才引进。在他们的安排下,“英文部”主任既是帅才,又是将才,组成了当时最强的英文编撰队伍。我查了很多资料,发现商务印书馆吸收英语人才的四个重要渠道——学缘、乡缘、地缘,还有教缘。颜惠庆的丈人是张元济的座师,颜惠庆与徐铤、谢洪赉与奚若都有师生关系,这是学缘;谢洪赉、周越然、甘永龙、茅盾都是浙江人,有地缘和乡缘的因素。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夏瑞芳、鲍咸恩和高凤池等,以及谢洪赉、颜惠庆、邝富灼、奚若等都是基督徒。当然,上述“四缘”仅仅是商务寻找人才的渠道,是否聘用编译人员的最重要标准,还是学问能力和为人处事。在商务印书馆早期英语教科书编辑队伍中,许多编者都有着丰富的教授英语的经验。像谢洪赉、颜惠庆、邝富灼、周越然等都或长或短出任过不同程度学堂的英语教员,邝富灼当过广州方言学堂教员、颜惠庆是圣约翰大学

的教授。另外,邝富灼、颜惠庆、奚若都是喝过洋墨水的“海归”;谢洪赉、徐铤等又是国内著名教会学校的毕业生。不过,对于学历,商务印书馆其实是不拘一格的。比如周越然曾在一些传教士办的私人学堂里就学,没有什么正式学历;葛传槩毕业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函授学社英文科,就是现在的夜校。但这两位“英文部”的编辑后来都成为著名的英语专家。这样的选人标准,也是商务印书馆会在旧学向新知识转换的过程中,成为新式英语教科书编写引路人的重要条件。

二、重视利用馆外的编译力量。商务印书馆聘用了一批大学者担任馆外编译。如严复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了英语语法书《英文汉诂》,且为三部以上辞典写过序;辜鸿铭为商务印书馆编译过《痴汉骑马歌》;伍光建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编撰了多种英语教科书,还为该馆校订过好几部英汉辞典;邝富灼推荐介绍来的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、担任清华学校副校长的周治春和湖南高等学校英文教员胡厚甫,都为商务印书馆编过书。根据张元济日记,可以发现他非常注意利用社会资源,比如他提到湖州人邵家麟“亦约翰书院毕业生,

现充荷领事翻译,汉文颇好,办事亦精细”。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懂得尊重学者,爱护外语人才,特别是知晓如何调动和发挥馆内外著名学者的作用,使得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英语教科书的编撰上始终占有绝对优势。

三、慎选合适的名家名译。商务印书馆“英文部”在编译英文教科书与英文书刊方面,有一套卓有成效的选题、编选、审稿、校稿的书稿评价机制,即使是对名家名译与名著,仍在编审上采取审慎态度,进行严格的质量把控。有一个例子,当时清华大学知名教授、外文系主任、自幼负笈英伦的王文显编写了一部英文剧本,交稿后商务印书馆先后请三位专家——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、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、“英文部”编辑葛传槩进行审读。放到现在,大多数出版社一般也只请一位外审。而且,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两位写了评语之后,葛传槩又写了很多意见。这些严格的审稿措施,保证了商务版英语教科书和英语读物具有较高的质量,使商务版英语教科书令学界刮目相看。

四、建立自身的批评系统。商务印书馆在馆办的

《教育杂志》上设有“介绍批评”栏目,既刊登对其他出版社出版物的批评,也刊发对本馆出版物的批评。如指出许多商务版英语教科书的错漏,不讳言“间有错漏,亦已签出”的事实。有些具体案例:批评邝富灼撰的《英文作文教科书》“书中不列中文,欲使学者自得之也。独插图偏以中文为题,则未免自乱其例耳”;批评《英文益智读本》“惟插画间有失检处:如 117 页之土耳其人浴,而图乃作一盘辫于顶之华人;132 页之网球图,未画界线是也”。这样的气度在今天的出版界,也是极为罕见的。正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纂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,才有这样的自信。反过来,也正是因为商务形成了一套教科书编撰的自我完善机制,才使其出版的英文教科书不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,而且在质量上也名列前茅。

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的出版界算是一个巨头。可以说,商务印书馆是倚仗近代教科书编纂与出版而崛起和发展的。那么,商务印书馆为什么会崛起?首先要占领市场,这得靠教科书,英文教科书就是一个重要方面。

1906 年,清学部(作者注:即清政府教育部)第一次审定颁行的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,就是我们现在讲的“部定教材”共 102 种,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就有 54 种,占 52.9%。1910 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、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共 84 种,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 30 种,占 35.7%。由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,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教科书不仅“量”多,而且“质”也见长。

传统史学都很重视“人”和“事”的研究,我这次以商务印书馆的“人”和“事”为题,是想说明,在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作坊到大型托拉斯文化综合体发展的过程中,有许许多多的“人”参与了这一改变历史的过程。当我们把曾经影响了商务印书馆诞生、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人物,把那些改变商务最初印刷商的形象、在文化界奠定独特的出版地位的“英文部”的若干具体的“事”,充分考虑进去,或许对于反思过去 120 年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,会有重要的价值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,本文相关内容曾在“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 120 周年”主题系列讲座中讲演)

